



徒向金田集结。1851年1月11日，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，建号太平天国。

1850年3月，洪氏在武宣东乡称王，起义军攻克永安后，洪秀全分封诸王。义军先后攻克长沙、武汉、九江、安庆，于两年后攻克南京，改称南京为天京，颁布《天朝田亩制度》。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，杨秀清、韦昌辉被杀，石达开被逼出走，义军力量遭到削弱。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攻破天京，太平天国起义宣告失败。

在洪秀全的心灵结构中，农民、儒生的成分占绝对多数。这从日后他做皇帝，搞专制，任人唯亲，天朝主义，妻妾成群，幻想过小天堂日子等小农意识和帝王思想中可以看出。

所以，洪秀全虽然借用了基督教的外衣，但本质上仍旧是陈胜、吴广以来的农民起义领袖，不可能搞出什么新意思来。然而，他毕竟是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真理，并利用其搞革命的农民领袖，尽管是学得一些皮毛，尽管历史注定不可能由这个阶层来推动中国现代化，因为这个阶层本身就属改造之列。但他总算是一个开端，因为历史的演进要有一个过程。

至于他的手下，比如洪仁玕、石达开，都是值得和洪秀全一起研究并且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。

2.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

容闳，号纯甫，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镇，1912年卒于美国哈特福特城。容闳幼年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南屏镇与澳门隔海相望，最早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。容闳的寡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，不愿儿子走旧式的科举道路，遂送他入读西式学堂，于13岁时进入玛礼逊学校读书。该校于1842年迁至香港铜锣湾一带，容闳也跟着到香港。

1846年底，校长布朗离港赴美前，向学生宣布，他愿意携



带学生数人赴美留学，由学生自愿报名。容闳是自愿报名者之一，后征得母亲同意，于1847年1月4日同黄胜、黄宏等3人从广州黄埔港出发，经过3个月的航行，于4月12日抵纽约，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预科班就读，学费来源于教会津贴或勤工俭学，两年后毕业。在此期间，他受洗加入基督教。毕业后如欲继续深造，必须填写保证书，保证志愿从事传教士工作。容闳拒绝了，他说：“传道固佳，未必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。”他的目标是教育救国。

1850年，容闳的志向获得了布朗的理解，布朗请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给容闳以资助，后容闳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。这是中国第一位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。1854年，容闳毕业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为了使后人能像他那样受文明教育，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，容闳毅然放弃美国的就业机会返回香港。

容闳回国后，他先后在香港当派克公使的书记员、审判厅译员，1856年到上海海关任职。1860—1863年到九江经营茶馆，颇有斩获。此期间他并没有忘记他的理想，实际上他到九江至上海一带活动，就是想接近当时交战的朝廷与洪秀全双方，看哪一方是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的方向，能够实现他的抱负。

他于1860年冬潜入南京，见到了当时的干王洪仁玕，受到了礼遇，并准备封他四等义爵。他向当局提出七项改革措施：一是依正当之军事制度，组织一支良好军队；二是设立武备学校，以养成多数有学识之军官；三是建设海军学校；四是建设善良政府，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，为各部行政顾问；五是创立银行制度，及厘订度量衡标准；六是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，



以耶稣教圣为主课；七是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并表示如愿采纳，甘当“马前走卒”。但是当时太平天国忙于打仗，洪秀全更是终日于深宫内院，与宫娥美女饮酒作乐。容闳觉得这帮人不成大器，只好求洪仁玕发给护照，离开天京。其实，洪仁玕也没办法，他自己在香港四年，比洪秀全更了解现代社会，因此颁布了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其结果也是一纸空文。因为好的制度必须由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去执行。这件事反过来更坚定容闳原来的设想：循序渐进，教育先行。

容闳离开太平天国以后，重新寻求能助他实现理想的人。容氏的救国方案，本来就是需要一个政权来作依托的，所以他必须走上层路线。1862年夏天，他在安庆找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烈文，希望通过他引见给曾国藩。这一次容闳没能见到曾国藩。1863年，曾国藩为了办洋务，邀请容闳到安庆会晤。容闳到安庆后第二天，与曾国藩会谈了30分钟，曾氏的才识、道德给容闳留下很好的印象。数日后，容曾两人又再一次面谈，曾问：“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，当从何处着手？”容答曰：“应先立一母厂，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。”

两星期后，容闳被曾国藩任命为出洋委员，拨银六万八千两，全权负责到美国采购设备，设立“江南机器制造局”。1865年，容氏采购机器回国，到徐州会晤曾国藩，被清政府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官衔。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，容闳建议“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”，获得曾国藩赞同。容闳终于迈开了教育救国的第一步。

此后容闳的教育理想是通过他的广东老乡、潮汕人丁日昌帮助实现的。容、丁二人一度过从甚密，丁氏受到容氏的思想影响甚大。后来丁日昌的官越做越大，经常拉容闳到手下做事，还介绍一位郑姓姑娘与容氏结婚。容闳利用与丁的私人关系，

多次提出由政府派遣青年出国留学，丁日昌大加赞许，并多次向曾国藩、李鸿章面陈。但此事一直没有结果。

1870年，丁日昌奉命赴天津办理教案和中外交涉，电召容闳至天津充当随员，参加数次谈判。这次办理教案的四大臣是曾国藩、李鸿章、丁日昌、毛旭西。容闳乘此机会，向丁日昌提出他的留学计划，并请他向曾国藩重提此事。一天，丁日昌告诉容闳此事已经征得曾氏同意，将由四大臣联名上奏朝廷。容闳听后，欣喜若狂，夜不能寐。

1870年冬，清政府成立留学生事务所，以翰林学士、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监督，容闳为副监督。容闳亲自选拔留学生。1872年夏末，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，渡过太平洋，到美国斯普林菲尔留学。留学生中“南人十居八九”。关于这一经过，容氏在其《西学东渐记》中有记载：“当一八七一年之夏，予因所招学生未满足第一批定额，乃亲赴香港，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，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，以足其数。时中国尚未有报纸以传播新闻，北方人民，多未知中国政府有此教育计划，故预备学校招考时，北方应者极少，来者皆粤人，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。百二十名官费生中，南人十居八九。”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，香山县华侨众多，又毗邻澳门，所以报考留学生的自然是南人居多，北方人因信息闭塞，加上还处于旧文化观念的统治之下，所以响应的人就少。这批留学生中，就有詹天佑、唐绍仪等后来的著名人物。

1876年，为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，母校耶鲁大学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。容闳在美国期间，还认识了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，两人成为好朋友。

容闳从事派遣留学生的的工作，当时被守旧势力斥为“离经叛道”，陈兰彬即属于这类人，对留学生吹毛求疵，与保护学生的容闳多有矛盾。1875年，最后一批留学生赴美之后，陈兰彬



请假回国三个月，向朝廷打小报告。12月，朝廷改任陈兰彬、容闳为驻美国、西班牙秘正副公使，另派翰林吴子澄为监督。吴也属守旧派，诬蔑留学生没有得益，国家反而受损，建议解散留学生事务所，撤回留学生。1881年，朝廷下令撤回留学生112人。原定的留学十五年的期限并没有执行完成。这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。这次挫折对容闳的精神打击是不言而喻的。它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及其守旧派的顽固不化、封闭狭隘的心态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

1898年戊戌变法，容闳恰好在北京，他的住所成为维新派领袖开会的地方。变法失败后，维新人物被捕杀，容闳逃至上海，隐身于租界之中，组织上海强学会，被选为会长。1899年赴香港，两年后赴美国，经过台湾时，当面痛斥日本的台湾总督玉源太郎侵略中国。

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曾邀请容闳归国，为巩固幼年的共和国而尽力，惜容氏此时已经年迈，再也无力参加革命。1912年4月20日，容闳病逝于哈特福特城。其子容覲玉参加广东军政府，担任制造局总工程师并被授予少将军衔，后来遭袁世凯逮捕监禁。

容闳开创的留学教育，功在史册，泽遗后世。可惜现在已少有人谈起，中国的大学中，处处有孔子像、陶行知像，却没有容闳的一点痕迹。为什么容闳被遗忘？按鄢烈山先生的说法，是因为他没有做过官，在官本位的国人眼中，他就不会那么耀眼。笔者以为，容闳的远见超出了他同一时代的人，包括今天那些囿于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照样不能理解他。一个不被理解的人，被抛弃和遗忘乃是正常的。

2004年12月21日，耶鲁大学接受容闳的故乡珠海市捐赠的容闳铜像，立于“贝茨楼”大厅中央，耶鲁大学举办一系列活动，纪念容闳毕业一百五十周年。国内也在8月3日，在北

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“中国首位留美学生毕业一百五十周年暨《大学工作》中文版发布会”，有100多名中外大学校长参加。

3. 差一丁点就改写中国历史的康有为



康有为，又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戊戌变法后，改号更生。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丹灶镇苏村，1927年3月31日卒于青岛。1888年，康有为赶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，请求变法，受阻未上达。1891年后，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，收徒讲学，弟子有梁启超、陈千秋等人。其后又曾在桂林讲学，弟子多达千人。1895年，他到北京参加会试，得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联合1300多名举人，上万言书，即“公车上书”，又未上达。当年5月底，他第三次上书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。1897年，德国强占胶州湾，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。1898年6月16日，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，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，准其专折奏事，筹备变法事宜，史称戊戌变法。变法失败后，康有为败走日本，后游历各国，宣传其君主立宪思想。

康有为30岁前没有走出过广东，其思想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两种渊源，与容闳于童年即接触西学并曾在香港、美国居住不啻天壤之别。康有为1879年经过香港，看到西方社会的缩影，才开始接触西学，后又经过上海，买了3000册西方著作研读。但其儒、释思想已深入骨髓，虽知改革的重要性，但终生无法脱离儒家的藩篱。他对儒家的思想尤为推崇董仲舒的公羊学，赞同孔子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，即乱世——升平世——太平世。他曾根据孔子的大同说创立自己的乌托邦学说，但他吩咐弟子